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

中國舊名 家論選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

朱士嘉 编者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
朱士嘉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大白楼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8 字数176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一版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113-4/K·0021

印数：1—4000 定价：2.50元

再版说明

清继明后，颇重修志。乾嘉时期，志家辈出。他们除参与修志实践外，对方志的源流、性质、特征、作用以及编纂方法等等也都各抒己见并诉诸文字。辛亥革命后，修志事业亦有所发展，特别是对方志学的理论又有新的探讨。

当前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不能不涉及前人留下的资料。创新来之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不求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要批判继承，对前人的遗产就必须作出必要的重温。为此，蓉江先生在自己多年的积累中选编了这本“论选”，以供当前编修新志、整理旧志以及探索方志学参考。

这本“论选”收录了二百六十四年间（1676至1940）我国十五位著名学者和方志名家所撰方志论文二十七篇，十七万余字。每篇都附有“编者按”，介绍撰人的生平及其论文的中心内容，并指出各派观点的异同、优缺点及其影响。

蓉江先生已属耄年，然仍潜心学术、诲人不倦，准备再出“论选”补编，以惠后学。这本“论选”得以再版公开发行，是方志学界的大事。在此，我们对蓉江朱士嘉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黄道立

说 明

《中国旧志名家论》选收录二百六十四年间(1676至1940)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纪昀、洪亮吉、鲁一同、钱泰吉、孙诒让、梁启超、王葆心、吴宗慈、瞿宣颖、黎锦熙等十五位所撰方志论文二十七篇，十七万余字。每篇附有“编者按”，列举撰人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以及论文的中心内容，并指出各派观点的优缺点及其影响。

此书选编的文稿，对于研究方志的源流、性质、特征、作用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修志经验，推陈出新，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有参考价值。

在编著此书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北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得到白寿彝同志、许仲凯同志、刘淑娟同志和陈上岷同志的热情帮助；又承蒙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题书签。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所加按语未必确切，或尚存在其他讹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 士 嘉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次

一、营平二州史事序·····	顾炎武 (1)
二、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方 苞 (5)
三、乾隆汾州府志例言·····	戴 震 (8)
四、方志辨体·····	章学诚 (14)
方志立三书议·····	(21)
州县请立志科议·····	(28)
报广济黄大尹(恺)论修志书·····	(34)
记与戴东原(震)论修志·····	(36)
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一书·····	(39)
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二书·····	(43)
修志十议·····	(48)
五、钱大昕修志议·····	钱大昕 (56)
(一)鄞县志局与同事书·····	(57)
(二)续通志列传总序·····	(57)
(三)宋元明方志题跋九则·····	(59—63)
附：(一)张心镜乾隆《蒲城县志》序·····	(64)
(二)王葆心案语之一·····	(64)
(三)王葆心案语之二·····	(66)
六、嘉庆安阳县志序·····	纪 昀 (69)
附：嘉庆安阳县志凡例·····	(73)
七、泾县志序·····	洪亮吉 (76)

八、咸丰邳州志后序·····	鲁一同 (84)
九、海昌修志开馆条约·····	钱泰吉 (89)
海昌备志发凡·····	(92)
十、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	孙诒让 (96)
十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	
之总成绩——方志学·····	梁启超 (100)
十二、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	
纂辑派争持论评·····	王葆心 (117)
十三、修志丛论·····	吴宗慈 (138)
十四、志例丛话·····	瞿宣颖 (192)
读方志琐记·····	(226)
十五、方志今议序例·····	黎锦熙 (231)

营平二州史事序

顾炎武 撰

编者按：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著有《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

顾氏《营平二州史事序》提出修志的标准：
（一）必其人有学识；（二）必网罗天下书志略备；
（三）必身历其境而复按得实；（四）必需以岁月
而不能草率从事；（五）文字不尚臃涩，而力求
通俗易懂。

以上标准是在他总结前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来的，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编写地方志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顾氏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征引地方志一千多种，反映了各省府州县的地形、农业、水利、赋税、兵防和中外关系等情况，为我们树立了选辑方志资料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榜样。

王葆心称赞《营平二州史事》（已佚）以大事记形式进行著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涵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则大将军已不及见。又以其余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其后七十年，而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长暨士大夫来言曰：“府志稿已具矣，愿为成之”。嗟乎！无郭君之学，而又不逢其时，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论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是非仆所能；独恨《燕史》之书不存，而重违主人之请，于是取二十一史、《通鉴》诸书，自燕秦以来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为六卷，命曰《营平二州史事》，以质诸其邦之士大夫。（下略）（《亭林文集》卷二页六，《营平二州史事序》，山隐居校刊本）

王葆心按：黄本诚《新郑县志凡例》引此事而节其语意曰：“昔顾亭林在永平，或属为府志，亭林谢之曰：‘郭造卿在戚将军幕府，搜罗天下书志略备，盖十年而成《燕史》，而今无其时故也。’”近来郡县皆有志，复视之，则多亭林所谓取成于数月之内者耳。今虽学谢前人，非力所及，必不敢苟为率略，以犯前人之讥。余举黄氏撮举之旨，按以顾氏原文，可考见顾氏修方志之旨要，其语直括尽明清两代四五百年修志之得失。亭林之意：一、必其人有学识；二、必收天下书志略备；三、必身历其地，而复按得实；四、必需以岁月；五、文字不尚晦涩。此其得也；否则以域外之人，又取成于数月之内，此则自来地方官主持修志，而又仓猝成书，万方一概，莫

不皆然，各行省地方所以罕佳志，职斯故也。《四库提要》称：“顾氏娴于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然即其综论志书之利病，实早开二百年来修志正当之主裁，堪永作龟鉴者也。至此所作之《营平二州史事》又为今日修志体例中之要事。《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收此书，作《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云：凡在辽水东者，东至朝鲜之境，皆古营州地。平州即今永平府，在虞时亦为营州地。炎武游永平时，邦人以志属之，炎武未应其求，因摭古来营平二州故实，纂为六卷付之，题曰《营平二州史事》。今其书不存。此本出自惠栋红豆斋，惟载二州古地名，至五代而止，又仅一卷，意其为六卷之一也。据此所言，知顾氏此作，即今日部颁修志概要所云，须特作大事记一门之目。方志冠以编年之大事记，始于宋高似孙《剡录》之“县纪年”及元张用鼎《金陵新志》，则名曰“通纪”。以后稍知修志体制者，虽作“记”、作“表”、曰“纪”、曰“编”，繁简不一，而皆有此一门也。然在清初，顾氏已为永平府创此例，足见开物之贤，所作必有本原，且可垂范后世者也。至郭造卿之本末，据《涌幢小品》称，郭山人，造卿，号健初，福清人，叶台山为之传；其《燕史》、《蓟略》，皆有成书。余考道光《福建通志》六十九经籍志，亦列郭氏所著诸书目，有《燕史》百二十卷、《卢龙塞略》四卷、《碣石丛谈》八卷，又《九边要略》、《永平府志》，殆皆在戚幕中所为者。又称：“戚礼之为上客，往来塞上十余年，九边三辅厄塞，言之如指掌。”均可与顾氏之言相证合，独惜其书今皆不传耳。然观于顾氏此序持论，后之修志，欲得佳书者，非具有此所言五种相应之要，殊未可率尔操觚也。

王氏又按：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艺文略”卷五·直隶方志，载《燕史》一百二十卷，明郭造卿撰。造卿字建初（注：

《涌幢小品》作健初）；福建福清人。嘉靖间贡生。总兵戚继光礼为上客，往来塞上十余载，九边三辅阨隘，言之历历如指掌。继光请撰《燕史》，未竟而继光去，造卿曰：吾不可以废成劳。遂留竣事，不受廩于官；告成，藏之篋衍而归。藁存闾中。造卿尝受业罗洪先，从游汪道昆，皆奇其文。所著有：《卢龙塞略》、《碣石丛谈》、《九边要略》、《玉融古史》、《海岳山房集》、《上杭县志》、《永平府志》；又著有《大宁考》，附《永平府志》中。其诗文苍丽淹雅。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考》，检书隶事，一千五六百种之多，犹以不获见《燕史》为憾。道光中，刘喜海权兴泉永道篆，于厦门旧绅家，得见全藁，以属总兵孙仪国为之钞录。喜海旋去闽，之陕右、之甘凉、之西蜀，道途遥远，仪国未得邮致，寄贮于吴闾，将以遗之。迨喜海开藩两浙，始得见钞本，简帙散乱不完，装为八册，三十四卷；其目凡十：曰政纪、曰统纪、曰雄纪、曰镇纪、曰敌纪、曰督纪、曰道纪、曰系纪、曰裔纪、曰朔纪，各系以小序，前引书，后论断。自汉迄唐、华夏征战，置州略地，极其精详。喜海乃属高锡蕃为之校讐；又属周其口为之重校，俟获全书，即付剞劂，而卒不果。今刘氏钞校本，为贵筑黄彭年得之京师，亦无由觅其全书，为深惜焉。

王氏又称：《燕史》一书，尚存三十四卷，在贵筑黄氏；第所不解者，黄氏既列此书目于志，乃至沿革、山川、关隘、河渠、兵制诸门，绝不一引用其书，俾世人略窥见其一斑。是此书今日存佚不可知，先已埋没几许于黄氏手矣。

编者按：本文及其他各篇所引王葆心有关方志的接语等，系七十年代末期编者在湖北省博物馆传抄的。

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方 包 撰

编者按：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号灵皋，学者称“望溪先生”。安徽桐城人。

方氏于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致书一统志馆诸翰林，力主修志务必体例一致，“以多方收得之群书互参”，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

王葆心认为方氏以讲学家身份发表志家新派的意见，并引伸说：“修志……必先取旧新各志联贯参观之，其继又必取各直省之省府州县志对照参观之。”

王氏又指出：傅王露为新开之纂辑家（旧派），其预修雍正《浙江通志》执行上级有关“述而不作”的指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傅氏对志家新派提出的批评意见尚中肯，值得我们借鉴。

仆未受事时，旧志勿论，既立条例，后新纂一部，稿成，随命学子校勘，次由再之，仆三之，始发誊录；及观清本，而罅漏又自见矣；班覆之而更写焉。自视若无遗憾；及各府州志毕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诸公勿谓此文之浅者，心与目毕至焉。而后知其曲艰也。《明统志》为世所诟病久矣，然溯

书其，尚似一人所条次。譬为巨室，千门万户，各执斧斤，任其目巧，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是书所难，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迹。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为富，而不能辨其出入离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复讹舛牴牾之病，纷然而难理；不知辞尚体要，地志非类书之比也。所尚者简明，而杂冗则愈晦。然简明非可强而能，必识之明，心之专，偏于奥迹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后辞可约焉。其博引而无所折衷，乃无识而畏难苟且以自便之术耳。故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也；博引以为富，而无所折衷，犹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约焉，即各致其美，而于体例已不一矣。望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实心集公事，而毋师其成心，仆敢不虚己以听乎？（《望溪先生文集·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王葆心案：此方志新体，纂辑派初张时，而讲学家以旧派尚简之体相诘难之词也。考雍正七年，诏天下各修省志以备《一统志》之采择。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称：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擢内阁学士，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又《年谱》附录文目编年云：癸丑，《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是方氏六十六岁之作也。其云：“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为富，又不能辨其出入离合而有所折衷。”是盖纂辑家之长用之于修志者。据《浙江通志》总修傅编修王露所为后序曰：“臣常备员史局，恭荷恩命，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钦遵编纂御书体例，凡经史子集，悉采辑原文，标列书目，或辞义冗长，仅从删节，毋许妄易一字，煌煌定制，盖深有契于圣人述而不作之义也。雍正七年，诏修通志，浙江辛亥开局，而属臣露董其成。臣惟志之于史，体裁虽或不同，其为记事之书则一也：先述史书，继述志乘，旁及名人之撰录，下逮里巷之讴吟，遐搜博讨，按古证今，而要不外乎述者近是。是编记载，虽未能有

当于史氏之择，而恪守内廷编纂之例，一本于述。”观此，则方志纂辑家悉本此旨，故一统志馆诸翰林亦如之。望溪以讲学家与其事，其析此种意见有不足。其云：“地志非类书比也。”而傅氏序通志，则曰：“志书之与类书，亦何所区别乎？班固‘十志’，原于史迁之‘八书’。而历代史氏因之，若律历、礼乐、刑法、食货之属，皆类也，而均谓之志。唐杜佑《通典》，而刘昫志经籍，列之类家。宋郑樵辑天文、地理、职官、选举等类二十略，而统名曰《通志》，则类书之称志，有由来矣。”余观祝穆《方輿胜览》，《四库提要》谓其名为地记；实则类书，其言亦与傅说同，但其说究不为方氏所取，方则必由博返约为能；又惧众手之此博彼约，有伤体例，故望诸翰林皆由博返约焉。其云：“方新纂一郡稿成，自视若无遗，及各府州志毕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此诚甚深阅历参透之言。盖志书之漏略或违谬，单据一书，毫不觉察，必以多方收得之群书互参，则先之见为不疏不误者，至是而罅隙百出矣。此余所以主修志之开始，先必取旧新各志联贯参观之；其继又必取各直省之省府州县志对照参观之，正恐犯望溪之所病也。方氏诚过来人哉！其云：“统志莫难于建置、沿革、山川、古迹。”诚为知言，实则方志之职官、选举，亦不易得其正确无歧也。惟傅氏既为开新之纂辑家，其后序中却又不满所谓著作家者；其说曰：“后之作志者，以为志与史异，不妨自为论撰，以成一家言，究亦未尝不掇拾前人之绪余，而不言所自出，人亦不复辨其所从来，遂尽掩古人之作以为己有，甚而割裂文义，颠倒字句，或不免以文害词，以词害意，承讹袭舛，辗转相仍，而反借口于前人之失，不亦惑欤！至于记载时政，则多隐括其事，变易其文，而语焉不详，意指流失，使后之人

（转第13页）

乾隆汾州府志例言

戴 震 撰

编者按：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

戴氏在乾隆《汾州府志例言》和乾隆《应州续志序》中强调“古今沿革，作者首以为重。”因“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

戴氏这个论点为他的学生段玉裁所继承（见乾隆《富顺县志》），但为章学诚所反对（参考《文史通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王葆心持论公正，认为“此乃戴氏一家之学说，存其义，深有益于方志。”王引伸说：“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流传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明。”

汾州自前明万历二十三年改府，越十余年知府王道一始纂次府志，成于万历三十七年，距今百六十余年，中间纪载阙如；府属一州七县志，虽各有增续，亦距今数十年；至有体应系之府者，州县志固不得而详。况各志具存、纂次多非其人，往往因陋就简，稽其山川形势及民间利病，启卷茫然。夫以百六十余年之远，八州县之广，官事民事，治安所在，不可听其散逸也；用是访辑成书，盖不敢云少待矣。

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古曰州，曰国；国分分邑，其后为郡县；又其后设州以统郡，郡以统县，而隋唐间，州与郡无别，惟称名互改而已；明以来则曰府，曰州，曰县，其间分合移徙，随时不同：如一西河郡也，其初在河西，旧呼为河套，今鄂尔多斯左右翼，六旗居之，后汉永和五年始徙今府属之永宁州，北魏太和八年始置于今府治南十六里之故兹氏城；孝昌二年则侨置平阳界；北齐复太和中之旧。一汾州也；其初在今隰州，孝昌中移今府境西，魏别置汾州，在今陕西宜川县。北周以东魏之南汾州为汾州，在今吉州；寻又置汾州于今霍州；隋汾州亦与北周同；唐武德三年复孝昌中之旧。一平遥也；其初曰平陶，在今文水县。一介休也；孝昌二年侨置平阳界。永安中又侨置汲郡界。今平遥县，汉中都也；而北魏之中都，徙置于榆次。今孝义县，三国魏之中阳也；而汉、中阳，西滨黄河，北魏太和十七年于此置永安县，而孝昌二年则侨置平阳界；前乎北魏者，后汉、魏、晋之永安，皆今霍州。北周攻拔永安城，亦在彼，不在此。昔人考之不审，徒检史书中涉乎西河，汾州，中都，平遥，介休，永安之名者，取而列诸名宦、人物，因又祀于名宦祠，乡贤祠；论其世，考其地，实非官于斯，产于斯者也；而此地之名宦、人物，往往遗失之。故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

星野次乎沿革，其说起于《周礼》九州之分星；至春秋时言列国分星尤详；《汉书》乃以郡县隶之，然于古州国往往齟齬不合，盖秦汉间已失其传，非实有所见而分之者也。存古说以见梗概，而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作志者或先及之，非其次矣。至若绘图星像，录步天歌，尤属固陋。

疆域次沿革、星野之后，考今自是始也。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

山川次乎疆域，其莫也，本天地之自然，而形势在焉，风气系焉，农政水利兴焉；作志者往往散列，漫无叙次，三者无由见也。今以水辨山川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枝，为来为去，俾井然就叙。水则以经水统其注入之枝水，因而偏及泽泊、堤堰、井泉，高高下下，不失地防；兴水利，除水患，从是求之，思过半矣，故兼及自昔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浚之功，备详其下。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务求切于民用。从来作志者仅点缀嬉游胜景，何小之乎视山川也。

城池、官置、仓廩、学校、坛壝、关隘、营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凡十有一者，官事也、民事也；纲之，纪之；富之，教之；抚之，卫之；用之，缓之；政之大体，于是乎在；民之利病，于是乎在，故次疆域山川之后。

职官、名宦、食封、流寓四者，至斯土者之往鉴也。人物、义行、科目、仕实、列女五者，宅斯土者之往鉴也。职官、食封，不可勿存也。府志于职官题目，多至丞簿而止。今载及县尉者，丞簿既裁，则职在丞簿下者，责务亦稍重也。名宦必其德泽及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贤不录，此二者所以著爱慕也。人物必大节卓然，义行必为善足风，或一事之有益于人亦附焉。科目、仕实，犹职官、食封之存之也。巍科贵仕，世俗之艳称，或无大表见，或有瑕疵指摘，又或后世仅知其官阶，失其行事，今不得而列之人物，如职官题名中有失其行事者，今不得而列之名宦也。史家列传外，分忠义、孝义、文苑等目，志书多仿之。然史之列传以爵位，故有爵位不尊及无爵位者，不得不列为目以纪之。志之人物，以人品学问德业，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于人物见之；专以文著者于科目、仕实中散见之，无庸复列。至于名教所弃，犹巧饰诬欺，